

消除影响请求权的体系整合与制度构造

温世扬 刘 昶*

内容提要：消除影响的规范目标是消除相关公众产生的错误认识。名誉权、标表型人格权、知识产权皆可纳入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立法表述中的“恢复名誉”因可完全被消除影响的规范内涵所吸收，且不具有类型化的解释论意义，故属于立法赘文。消除影响不具有预防与保全功能，应区别于绝对权请求权，系以过错为责任成立基础的债权请求权。作为一项事实陈述，消除影响的目标是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弥补损害，应将之区别于赔礼道歉，后者作为意见表达，意在为受害者提供精神慰藉，且不可被强制执行。在制度构造上，消除影响的适用应以相关公众确实产生了错误认识为前提，但是在个别情形下，法院可直接依据经验法则作出事实推定，原告不需要证明不良影响已经现实发生。应将比例原则纳入评价机制，以此判断被告所应承担的消除影响义务的方式与限度。

关键词：《民法典》 消除影响 债权请求权 恢复原状 比例原则

一、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79条第10项的规定，消除影响系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确立了此类责任承担方式的独立性。因消除影响作为民事责任被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自立法体例出发，似可作为一般规定，适用于所有权利类型被侵害的场合。然而，责任概念的使用无法脱离权利这一限定，只有在明晰权利的具体类型下，探讨“何人依据他人的何种权利承担何种责任”才有意义。权利产生意味着他人应履行某种义务，在未履行时要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责任的承担”应以“权利的溯源”为首要任务。^{〔1〕}因此，为了

* 温世扬，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昶，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参见冯珏：《我国民事责任体系定位与功能之理论反思》，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

准确把握消除影响请求权的规范内涵，首先需要完成从“责任承担”到“权利溯源”的思路转化，在具体权利层面探究消除影响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1000条规定，在人格权受到侵害时，行为人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应与其行为方式与造成的影响相当。该条虽并非请求权产生规范，并未描述何种情形下行为人应承担消除影响义务，仅是对法律后果的具体限制，但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在字面上将原先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扩张到了所有的人格权益。对此，有观点认为应作出限缩解释，即物质型人格权的侵害不应适用消除影响请求权，因其并未带来声誉等层面的恶劣影响，至于名誉、姓名、肖像、隐私等无形人格权被侵害时，则有适用的空间。^{〔2〕}与之相对，有观点仅笼统提及不良后果消除之必要，未限缩消除影响的适用范围。^{〔3〕}除《民法典》外，消除影响请求权可散见于其他部门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11条、第23条的规定，在编造、散布虚假及误导信息进而影响商誉时，侵权人负有消除影响义务。司法实务中，被告消除影响责任的承担超出了法律限定的范畴，若擅自使用他人名称或商标，进而满足第6条不正当竞争构成要件时，权利人也可要求被告消除影响。^{〔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2条也以“具体例举+兜底条款”的方式，规定消除影响请求权可在特定情况下得到适用。在司法实务中，消除影响请求权多被用于商标侵权。^{〔5〕}由此引发的问題为：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范围为何，背后有无统一标准。

不清晰的适用范围无疑为消除影响请求权的规范内涵蒙上了一层面纱，既有的立法体例更是加剧了消除影响体系定位的模糊性。根据《民法典》第995条的规定，消除影响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有观点认为，消除影响请求权应属于绝对权请求权，规范目标是为了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与过错无涉。^{〔6〕}也有观点将其与停止侵害等绝对权请求权作初步区分，并根据人格保护的特殊目的考虑消除影响特别时效的适用。^{〔7〕}更有观点直接否认该类请求权的绝对权请求权属性。^{〔8〕}此外，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关系亦含混不清。《民法典》第179条第10项将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并列，似认为二者系一体两面的关系。第11项虽将赔礼道歉作为独立民事责任，但认为其与消除影响应区分适用、同一适用的观点均有之。^{〔9〕}

〔2〕 参见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72-73页。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116页。

〔4〕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新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津民终941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90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张红：《我国民法中恢复原状的再体系化》，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2期；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7〕 参见杨巍：《〈民法典〉第196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评注》，载《南大法学》2022年第2期。

〔8〕 参见程啸：《人格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53-655页。

〔9〕 “区分适用论”可参见葛云松：《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适用》，载《法学》2013年第5期；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终316号民事判决书。“同一适用论”可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5928号民事裁定书。

正是因为消除影响的适用范围、体系定位均存在较大争议,故厘清消除影响请求权的构造基础,探析消除影响的适用情形,并为该类纠纷提供明晰的裁判规则,即成为《民法典》时代解释论的重要命题。

二、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范围

消除影响的目标是消除他人行为对权利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其恢复到权利被侵害前的状态,具有恢复原状的功能。然对于债权、物权等纯粹的财产性权利而言,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即可恢复原状,无需设立独立的消除影响请求权。^{〔10〕}对物质型人格权而言,生命损害本身不可能恢复原状。至于身体权、健康权,在物质损害层面,侵权行为一旦发生,可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填补损失。若被害人因侵权行为产生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可通过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方式填补精神损害。^{〔11〕}此时,尚可辅之以赔礼道歉责任使被害人在精神层面得到慰藉,减轻侵权行为对被害人在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故独立的消除影响责任并无必要。由此一来,财产权及物质型人格权应排除在消除影响的适用范围外,问题聚焦到他种人格权之上。其中,隐私权作为精神人格权的一种,权利侵犯以隐私被披露为样态。而隐私因披露而不再成为隐私,故难以真正恢复原状,只得通过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赔礼道歉等方式抚慰被害人,消除影响请求权并无适用可能。行动自由权同理,因其以自决地位为核心,^{〔12〕}故只要侵权人停止对他人意志或身体行动自由的干涉,方可使人身自由恢复至圆满状态,也无消除不利影响的必要。因此,为了证立消除影响请求权的独立性,需要结合他种人格权展开讨论。

(一) 受损的名誉

1. 通过“消除影响”以“恢复名誉”

名誉权作为精神型人格权,以维护人格尊严为逻辑起点,其规范核心系名誉内涵的界定。依照通说观点,名誉系指社会公众对民事主体于品德、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应将其与自我评价为核心的“名誉感”区分开来。^{〔13〕}《民法通则》第120条将名誉被侵害纳入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对此作历史解释,《民法典》第1000条人格权的范畴当然也应当包括名誉权,司法实务中亦不乏其例。^{〔14〕}当权利人的名誉因不实陈述而被侵害时,也表明其社会评价会被不当降低,从而产生了负面影响。对自然人而言,因社会负面评价所产生的损害是在精神层面,侵权人负有义务消除负面影响,然单一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无法达到消除不利影响的目的,赔礼道歉并非直接

〔10〕 依据传统理论,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有两种责任承担方式,分别是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前者致力于维护被害人的完整利益,后者致力于维护被害人的价值利益,二者发挥的都是损失填补功能。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14页。

〔11〕 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主要有两项:补偿与安抚。对此可参见〔德〕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德国侵权法——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及痛苦抚慰金》(第5版),叶名怡、温大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235页。

〔12〕 参见温世扬:《民法典视域下的“人身自由”》,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3期。

〔13〕 参见前引〔8〕,程啸书,第322-325页;前引〔9〕,王泽鉴书,第151页。

〔14〕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申7804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申5158号民事裁定书。

指向必要事实之澄清，故要求侵权人履行消除影响的义务有特殊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侵害名誉权的方式除了事实陈述以外，亦有意见表达。后者往往仅对某事件发表好或坏、赞同与不赞同等意见，而不指向事实的真伪。即便意见表达因构成了人身攻击而成立侵权，但其无涉于具体事实，是纯粹的观点输出，已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名誉权的范畴，只有与不实陈述相结合才会降低被害人的社会评价，纯粹的意见表达更接近“名誉感”的范畴，不会在社会层面产生对被害人的错误认知，仅会使被害人自尊受挫。对此，权利人仅需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同时主张侵权人赔礼道歉，即可达到维护“名誉感”的目的。

区别于《民法典》第1018条、第1032条将肖像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民法典》第1024条以民事主体作为名誉权的权利主体，故法人等组织团体也享有名誉权。然而，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权虽然具有人格权之名，但并不以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为构造基础，实为财产权的外化。^{〔15〕}当第三人侵害了法人名誉权之后，组织团体不会感到精神痛苦，但会因社会评价降低而有损商誉，从而产生经济损失，故由侵权人负担消除影响义务有特别意义。^{〔16〕}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029条将信用纳入名誉权的规范体系内，并未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类型。然而，信用与名誉的内涵并不等同，前者无关乎社会公众对特定民事主体的评价，多关涉特定主体间的经济利益，信用评级也仅可由特定机关（银行、法院）作出。^{〔17〕}该类经济评价与民事主体的资力状况息息相关，若某人被污蔑即将破产、在银行系统内的信用评级产生误报，均可认为侵犯了信用，此时民事主体除了可要求侵权人赔偿物质以及精神损害外，也可向侵权人主张消除影响进而恢复信用评价。^{〔18〕}

2. 作为立法赘文的“恢复名誉”

既然消除影响的目的是消除不利影响并恢复原告的名誉或信用评价，那么《民法典》第179条第10项、第995条、第1000条将恢复名誉独立于消除影响的目的何在？有观点认为，消除影响当然包括了恢复名誉，只不过恢复名誉是专门针对名誉权侵害所规定的责任形式。^{〔19〕}学者亦鲜有讨论恢复名誉与消除影响的关系，而往往将二者一并列举，似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适用情形与规范目的。^{〔20〕}司法实务中也多在名誉侵权时判决要求被告承担消除影响责任，并未与恢复名誉请求明确区分。^{〔21〕}事实上，对于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的关系，可以有三种解释路径。第一种是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特殊规定，当涉及名誉侵权时，应当优先适用恢复名誉请求权。第二种是认为恢复名誉仅仅是一项注意性规定，是在特别强调名誉权保护的重要性，属于消除影响请求权的例示规定。此时，消除影响属于兜底条款。第三种则是认为恢复名誉在本质上属于一项赘文，且

〔15〕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2页。

〔16〕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一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吉民三涉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17〕 参见前引〔9〕，王泽鉴书，第165-168页。

〔18〕 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申169号民事裁定书。

〔19〕 参见前引〔3〕，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116页。

〔20〕 参见前引〔9〕，葛云松文；张红：《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21〕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申260号民事裁定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吉民三涉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民提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

是隶属于消除影响请求权的“整全隶属性赘文”，可被消除影响所囊括，但在立法中并未采用简洁的表述，而是人为设置了该类语义循环。^{〔22〕}

第一种解释无疑过于机械，因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都被内嵌于同一法条，仅允许裁判者适用恢复名誉请求权而排斥消除影响请求权，通常不符合实际情形。法官在引用请求权基础时往往仅会具体到某一条某一款（项），但无论是《民法典》第179条第10项，抑或是第995条、第1000条，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甚至都在同一段落（项）内，故难以在技术操作上完全区分二者。第三种解释将恢复名誉认定为是一项立法技术不足产生的赘文，彻底否定了恢复名誉规定本身的实益。赘文与例示规定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是对语义逻辑的当然重复（如物权、债权之于财产就是纯粹的语义重复），后者作为类型列举则对避免司法裁量权过大具有重要意义，且可由此反推兜底条款的规范内涵，以划定规范解释的合理边界。^{〔23〕}因此，若恢复名誉对消除影响规范内涵的厘清具有解释学上的意义，应作为例示规定采纳第二种解释方案。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前述第一种方案被否定之后，消除影响也包括对名誉的不利影响，名誉恢复后，即表明不利影响已被消除。恢复名誉这一概念未在构成要件抑或法律后果上对消除影响作出足够明确的细化，仅是对消除影响具体亚类型的简单重复，其概念内涵可被内化于消除影响之中，故将其作为一项赘文而非例示规定，更符合赘文的特性。

（二）因不实关联产生的错误印象

侵犯民事主体的名誉权会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故要求被告承担消除影响责任并恢复名誉有其正当性。然而，消除影响的范畴不应限于名誉侵权。如前所述，无论是标表型人格权，还是以智力成果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在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均承认了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可能。事实上，上述权利可以起到将特定权利（财产）与民事主体相联结的功能，从而使第三方清楚权利客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侵权人的使用行为无疑会导致第三人对权利与权利归属主体产生错误认识，下文就上述权利类型分别展开讨论。

1. 利用他人人格标识产生的错误印象

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系典型的标表型人格权，其可使第三方根据外在标识符号识别特定人。当然，标表型人格权的权利类型并不局限于此。《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将声音纳入人格标识的保护体系内，实因其与姓名、肖像相同，具有识别个体的功能。^{〔24〕}个人信息也拥有指向功能，可将特定主体与他人相区别，所以也是一种人格标识。^{〔25〕}其中，就姓名权（名称权）与肖像权而言，早在《民法通则》时代，就于第120条明确规定了原告可主张消除影响请求权，法律并未对此设置任何限制。然而，消除影响的目的是消除负面影响，在擅自使用他人人格标识的情形下，究竟会产生何种不良影响？对此司法实务多语焉不详。譬如，有判决针对名称权被侵害，笼统地指出消除影响的目的并非弥补心理创伤，而是为了消除因名称权被侵害所带来的不良

〔22〕 整全隶属性赘文的内涵，系指他处已有此种法律表达，此处再展开相同或者亚类型的法律表达并无必要。具体内涵与例证可参见贺剑：《民法的法条病理学——以僵尸法条或注意规定为中心》，载《法学》2019年第8期。

〔23〕 参见前引〔22〕，贺剑文。

〔24〕 参见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25〕 参见温世扬：《标表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与规范构造》，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报）》2021年第6期。

影响，然其并未指明不良影响的含义。^{〔26〕}在“任达华与海南正大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肖像权纠纷案”中，针对被告擅自悬挂任达华肖像的行为，法院仅指出原告的肖像权受到了侵害，被告虽然擅自用他人肖像进行宣传，然其社会影响不大，故判决正大公司应在海口内有影响的报纸上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在本案中，裁判文书也未明确究竟何为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又要在报刊上刊登声明的理由。^{〔27〕}又如，在“姚明与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人格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针对被告擅自使用姚明姓名、肖像的行为，法院亦未指示说明不利影响为何，直接要求被告承担消除影响责任。^{〔28〕}

事实上，侵权人侵害了权利人的标表型人格权，完全有可能招致声誉下降的结果。譬如，擅自使用名人姓名，并将其用于自身广告宣传，将会形成姓名权人支持该商品的公众印象。^{〔29〕}若产品内容本身涉嫌虚假宣传，也会导致姓名权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构成名誉侵权。然此种不良影响可被名誉权范围所囊括，超出了标表型人格权的保护范畴。但是，用作推销的产品可能无质量问题，侵权人只是利用其人格标识为自己开拓产品的销售渠道，不会有损声誉，仅构成对姓名等标表型人格权的侵害。^{〔30〕}但此时并非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社会公众仍然会产生权利人支持某种商品的印象，进而错误认为其与指定商品具有主观上的特殊联系，并于潜意识中基于对该人的支持而选择该类商品，对于此类错误认识也有通过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的必要。

在“四川西婵整形美容有限公司、林心如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就指出，被告整容公司擅自使用林心如照片作宣传，并附之以医院服务热线与在线咨询方式的举措，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然社会公众并不会因此对林心如本人产生任何负面评价，并降低其社会声誉，故对于其侵害名誉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仅支持针对侵犯肖像权的公开赔礼道歉请求。^{〔31〕}在该案中，虽然法院并未指明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会产生何种不利影响，但却将肖像与推销方式联结起来，实质上暗含了该种冒用行为会导致错误认识的结果。此外，法院也将侵害肖像权与名誉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作出了初步区分，仅侵犯前者并不会导致社会评价降低，故对其适用独立的消除影响请求有独特意义。

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侵害人格标识的行为皆可适用消除影响请求权。比如，第三人侵害姓名权的行为可能是干涉姓名使用的行为，如不允许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更改姓名等。此时的姓名权保护仅系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保护的具象化，不会使公众产生错误认识，故无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空间。

2. 利用他人知识产权所产生的错误印象

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及商标权等。其中，著作权及专利权都是权利人创造性劳动的

〔26〕 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710号民事判决书。

〔27〕 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当然，本案中存在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混用的情形。

〔28〕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民三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

〔29〕 参见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2005年上易字第616号民事判决书。

〔30〕 参见崔国斌：《姓名商品化权的侵权认定思路》，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

〔31〕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501号民事判决书。当然，本案中存在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混用的问题。

产物，凝结了权利人智慧的结晶。该类权利与传统财产权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作为纯粹的财产权，仅权利本身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他人非法侵害该类财产权仅是为了获得财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与特定主体的人格利益一般并无联结，财产与权利人之间的归属关系多无价值。

然而，知识产权与特定主体归属关系的确定却尤为重要。因智力成果作为原创性劳动的产物，本就不同于物的简单制造，由社会公众正确知悉由谁创造了此类智力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毕竟，智力成果与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明确的归属关系对积极创造更多成果具有推动意义，可令其得到正面评价与物质褒奖，进而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对原创成果的支持。对于商标权而言，虽然商标的设计不需要创造性，但商标权仍被学界习惯纳入知识产权的范畴。^{〔32〕}事实上，商标权与著作权、专利权的相通之处在于，使第三方明晰权利的正确归属主体具有重要价值。商标本身亦系商誉的体现，将某种商标运用于某项产品之上，可令原先没有归属价值的产品因商标而凝聚了特别的商业价值。毕竟，产品是否归属于某人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商标可为此判断的作出起到识别作用。因此，若侵权行为使社会公众产生知识产权归属于某一主体的错误印象，行为人应承担消除影响责任。

具体而言，著作权可分为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著作权法》第52虽然规定了侵权人的消除影响责任，但仅规定应“根据情况”承担责任，并未明确消除影响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有观点指出，对于侵害著作人身权的行为，侵权人应承担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对于侵害著作财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承担消除影响责任。^{〔33〕}在司法实务中，也有法院认为侵害著作权人复制、发行权的行为，并未侵害权利人的的人身权，故不支持其消除影响请求。^{〔34〕}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只有在令社会公众产生混淆的情形下才承担消除影响责任，而发行、复制、放映等纯粹侵害著作财产权的行为若标明了著作权的真实归属，则不适用消除影响请求权。当然，并非所有侵害著作人身权的行为都可适用消除影响请求权。譬如，对于侵害发表权的行为，因作品一经公开即无法撤回，不具备恢复原状的客观可能，也无消除影响请求权的适用空间。但是，若行为人实施了抄袭行为，实质上是将他人的智力成果为己所用，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与作品完整权，将会引起社会公众对智力成果归属状况的误解，故被告应承担消除影响义务。^{〔35〕}

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包括专利侵权与假冒专利。专利侵权系指所有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专利技术的行为。因消除影响的目标是消除社会公众对产品与其归属主体之间的错误印象，故独立的制造行为并不属于消除影响的范畴，但在侵权人制造完成之后的销售、许诺销售以及与销售相关联的使用行为，均会使社会公众误以为侵权人系专利的原创者，自然应当由其承担消除影响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专利产品，抑或专利方法，都应成为消除影响请求权的客体，因二者都关乎相关使用主体对专利侵权人的评价。法律之所以要保护专利，是因为对专利的功能性

〔32〕 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7-398页。

〔33〕 参见前引〔32〕，王迁书，第257-258页。

〔34〕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926号民事判决书。

〔35〕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陕民三终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书。

使用可以裨益于使用者，而此类用户体验应当由使用者发出，并正确反馈于专利权人。擅自销售专利产品的行为令使用者客观评价的对象发生错误，擅自利用专利方法制造产品，则会令使用者产生对产品制造者的错误印象，如因所谓产品好用进而信赖该制造者，从而导致评价对象的错误。至于假冒专利行为，更是直接将他人合法的专利号用于自己销售的产品之上，并以此作为推销产品的手段，作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其无疑会使产品使用者误以为侵权人是专利权人，从而发生评价错误，^{〔36〕}故应令其承担消除影响责任。

三、消除影响请求权的体系定位

无论是恢复名誉，抑或是消除因不实关联产生的错误印象，消除影响的目的皆是使权利主体得到社会公众的正确认识，因为对于特定权利而言，令社会公众正确认识权利与权利主体的归属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在此意义上，消除影响也是恢复原状的一种方式。然而，恢复原状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绝对权保护、合同解除以及损害赔偿各方面具有不同的意义，其规范功能与构成要件并不相同。^{〔37〕}由此引发的问题为，消除影响作为恢复原状的方式，到底与何种恢复原状规范相当，又应当如何理解其与精神损害赔偿以及赔礼道歉的关系。此皆关涉消除影响的体系定位问题，故需详加探讨。

（一）作为“债权请求权”的消除影响

1. 多元的恢复原状请求

虽然任何使受害人恢复到权利被侵害前的状态，都可以被纳入恢复原状的内涵，然因客观样态不同，恢复原状返还的责任基础亦不相同，此会直接导致恢复原状所需的要件不同。譬如，物的返还虽形式上可被认为是一种恢复原状，但其权利基础是支配权，具备不容第三方侵害的绝对性，规范目标仅在于消除权利归属与事实状态的不一致，并将绝对权恢复至不受干扰的状态，故无权占有人脱离对物的占有即为已足，无需过错作为责任调节机制。^{〔38〕}不同于原物返还，在权利人被第三方不法侵害并产生损害的情形下，侵权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损害赔偿的方式可分为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39〕}例如，当汽车被他人损毁时，侵权人应根据被侵权人的要求承担恢复原状义务（修理），修理义务的履行即为恢复原状的一种。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恢复原状实际上是一种责任的转嫁，侵权人应当积极承担责任以消灭给付义务。此实际上已干涉了他人的行为自由，故需要过错作为责任调节机制。

合同解除及无效后的恢复原状略显复杂。以双务合同为例，其返还规则实际上折射着双务合同的牵连性特征，等价性亦始终潜伏于返还制度之上。^{〔40〕}无论是原物返还抑或是原物返还不能时的价值补偿，皆应坚持等价性原理，原则上应当相互返还，原物受领方不得以物损毁灭失为由

〔36〕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关于假冒专利方面的修改》，载《电子知识产权》2010年第4期。

〔37〕 参见冉克平：《民法上恢复原状的规范意义》，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8〕 参见朱虎：《物权请求权的独立与合并——以返还原物请求权为中心》，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6期。

〔39〕 参见前引〔10〕，王泽鉴书，第112-114页。

〔40〕 双务合同坚持等价性的重要性，可参见朱朝晖：《潜伏于双务合同中的等价性》，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主张自己系善意不当得利人而拒绝填补价值。^{〔41〕}在此意义上,双务合同无效时的给付型不当得利返还规则,实质上因无法适用不当得利的返还规则而不再构成不当得利,毋宁说是基于双务合同的特别清算规则。^{〔42〕}

由此可见,恢复原状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型,即基于绝对权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的恢复原状、(双务)合同无效并解除后的恢复原状,三者的具体制度设计及规范目的并不相同。消除影响请求权仅与侵权有关,显然不属于以上第三种类型。虽其并非赔偿性义务,但与损害赔偿责任同需损害后果发生,且以绝对权被侵害为责任基础,在构成要件与以上第一种及第二种恢复原状类型具有相似性,完全有可能因在类型学上相同而适用相同的规则,故需展开探讨。

2. 以“过错”为责任基础的消除影响

根据《民法典》第1167条的规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绝对权请求权被纳入侵权责任的范畴,故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的内涵要广于大陆法系损害赔偿的范畴,同时包含绝对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43〕}二者虽以违法性为责任承担前提,且都承载着恢复原状的功能,但前者仅要求权利行使恢复至不受干扰的状态,即可起到权利保全的功能,不需以过错为要件。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涉及损害在民事主体之间的转化,不能苛责于无过错的行为人,否则将会侵害无辜之人的自由。因此,消除影响的适用是否需要以过错为前提,即是体系定位的关键。结合两种请求权的不同特征,需要考量两个因素:消除影响能否起到权利保全功能,判令被告在无过错情形下承担消除影响义务是否会过度干涉表意自由。

一方面,对于物质型人格权,绝对权请求权的边界相对明确,即通过恢复权利至不受干扰状态的手段,使不法侵害人停止行为,进而排除其对权利行使的妨害,并不以损害发生为前提要件。^{〔44〕}譬如,对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权利人可以请求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如通过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方式,达到停止、预防他人对自身造成侵害的目的,但此时实际损害后果可能并未发生。^{〔45〕}与物质型人格权不同的是,他种人格权在损害发生后难以通过停止侵害等方式恢复权利至不受干扰的状态。如对于通过新闻报刊诽谤他人的行为,一旦造成了社会影响,就无法通过停止侵害的方法去除对名誉的妨害。毕竟,撤回涉嫌侵权的报刊、删除相关内容无法排除对名誉的妨害,因为主体的社会评价已经降低,相关公众亦无法清楚知悉撤刊、删除相关内容的背后原因,从而恢复权利人的名誉,故妨碍权利圆满实现的行为仍在持续。若权利人意图恢复名誉,只能通过刊登澄清声明的方式消除影响。在此意义上,消除影响因可使名誉恢复至事前状态,并消除已发生的侵害,具有权利保全的功能,似可被纳入绝对权请求权的范畴。^{〔46〕}然而,社会评价的降低是名誉权受损的结果,与健康权被侵害的损害结果(如被打伤)应作同一评价,在损害发生后,名誉侵权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名誉下降这一损害的妨害行为。作为一项被动的精神

〔41〕 参见叶名怡:《折价补偿与不当得利》,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3期。

〔42〕 参见叶名怡:《不当得利法的希尔伯特问题》,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

〔43〕 参见温世扬、刘昶:《肖像权的特质与规则表达》,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年第4期。

〔44〕 参见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45〕 参见朱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程序实现》,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1期。

〔46〕 参见王利明、程啸、朱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0-95页。

型人格权，名誉权被妨害（处于被不实评价状态）与损害（社会评价下降）本就为同一事物的不同面相，二者指向同一，恢复至事前状态即表明损害结果被消除。况且，消除影响请求往往发生于侵权行为发生并完成后，其目标是消除不利影响进而彻底恢复原状，不再单纯具有停止侵权与预防侵权的功能，已然超脱于绝对权请求权的基本功能范畴。

持绝对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区分的论者多认为前者的目标是使权利恢复至圆满状态，适用于权利实现受到妨害的情形。^{〔47〕}但事实上，即便存在妨害，损害一旦发生，仅有绝对权请求权无法使权利恢复至圆满状态。在他人无权占有物的情形下，若无权占有人不慎将物损坏进而导致价值贬损，即便所有权人主张返还原物，也无法恢复至事前状态，此时只能诉诸损害赔偿。某项具体人格权被损害后，虽然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可能仍在继续，停止侵害等绝对权请求权却无法使权利恢复至圆满状态，至多可维持不受继续侵权的状态，因被人打伤（健康权受损）、社会评价下降（名誉权受损）等产生的物质、精神损失，只能通过损害赔偿等债法途径解决，绝对权请求权难堪恢复圆满状态的重任。

另一方面，消除影响需要刊登澄清声明，义务人仅停止侵权尚不足够，需以积极履行义务的方式承担责任。因义务的履行需要侵权人积极配合，发布声明会干涉其表意自由，故与债权的履行属性相当，立足于人格权的绝对性无法推导出他人应当积极履行发表澄清言论的义务。毕竟，不表意自由也是人身自由权的一种，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彰显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48〕}在不存在归责事由的情形下，仍要求其承担消除影响义务，未免对行为人设置了不可预见的行为义务，因过度重视权益保护而偏颇。以名誉侵权为例，德国司法实践出于保护名誉的需要，在类推《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规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不以过错为要件、针对不实言论的撤回请求权（Widerrufsanspruch），实质上将其纳入了绝对权请求权的范畴。然而，撤回并不等于恢复，至多停留在停止侵害及排除妨碍的阶段，社会公众若不关注法庭裁判，也无法在观念上恢复对权利人的评价，不能达到消除影响的效果。德国之所以未设置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责任，全然是因为其社会文化重视个人意志与自由表达，故不可接受发布恢复名誉启事等行为。^{〔49〕}与之相对，《日本民法典》第723条都将可起到消除影响功能的“恢复名誉之处分”纳入与损害赔偿相当的评价体系中，并适用相同的过错要件，实为衡平不表意自由与法益保护的结果。尽管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国立足于国民性，在特定情形下承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之处分请求，但亦不得以过度牺牲自由为代价，过错作为责任转移机制理应承担权利冲突的中和功能。

《民法典》第995条虽规定消除影响与人格权请求权均不适用诉讼时效，但并非可当然认为立法者将其纳入了绝对权请求权的范畴。在立法讨论中就存在较多反对适用同一时效规则的声音，^{〔50〕}时效规则也并非当然与权利属性相关，无论是相对权、绝对权都有可能适用或者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因名誉权等权利被侵害后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要相关主体的错误认识一直存在，危害后果就一直存在，从而会造成持续的精神痛苦或财产损失，故适用特殊的时效规则有

〔47〕 参见前引〔44〕，王利明文。

〔48〕 参见前引〔20〕，张红文。

〔49〕 参见前引〔9〕，王泽鉴书，第449页。

〔50〕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

特别意义。^{〔51〕}

（二）与赔礼道歉的关系

《民法典》第179条第10、11项分别规定了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意对二者作出区分，然其边界仍存在模糊性。譬如，恢复名誉作为消除影响的手段，有可能以道歉信的方式作出。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亦有判决指出，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责令被告赔礼道歉可起到消除不良影响的作用。^{〔52〕}

如果赔礼道歉的内涵完全可被消除影响所涵盖，有可能与恢复名誉相同，因构成法律赘文而无区分二者的实益。但问题在于，赔礼道歉的内涵本就与消除影响不同。二者虽皆关涉侵权人的不表意自由，但前者意在“道歉”，后者意在“澄清”。澄清可使社会公众正确理解权利与主体的内在归属，仍是一种对客观损害的弥补，并使权利恢复至事前状态；道歉则更进一步，使人的良心上升为一项法律义务，迫使行为人批评自己的不当行为，以追求对受害人内心的慰藉，不再具有损失填补的单一功能。因赔礼道歉更强调慰藉而非损失填补，而慰藉只能作用于精神层面，故出于衡平与不表意自由关系的目的，对其适用范围也应当加以限定，即适用于人格尊严受损的情形。^{〔53〕}与此相对，消除影响的目的是恢复对特定权利归属状态的错误认识，这种权利既可能是人格权，亦可能是财产权，故恢复的既有可能是人格尊严，也有可能是商业信誉，本不与慰藉挂钩，其适用的范围也不完全同于赔礼道歉，只是二者刚好在特定权利地带（名誉权、表型人格权等）存在交叉。

因赔礼道歉强调对个人精神的慰藉，意在恢复尊严感，消除影响则强调于社会公众层面对不利影响的消除，意在建立起正确的社会认识，故即便适用的权利类型存在交叉，亦可在规范目的上对二者作出初步区分。^{〔54〕}然而，在权利类型存在适用上的交叉时，道歉声明一旦公开，也可以起到消除影响的作用。毕竟，“承认自身做错了某事”即表明之前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并产生了不利影响，发布道歉公告可以实现澄清真相、消解误会的目的，既“给了面子”，又“说了事实”，实乃一举两得。但是，赔礼道歉作为“意见表达”，是内心态度的外化，本不可能被强制执行，因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更接近自然之债，^{〔55〕}消除影响作为一项“事实陈述”，却可通过替代履行的方式由他人替代作出。

四、消除影响请求权的制度构造

由前述可知，尽管消除影响请求散落于多个部门法，作为以匡正错误认识为目标的债权请求权，其在规范功能与责任产生层面具有同一性，问题最终落脚到消除影响责任的落实上。消除影

〔51〕 参见前引〔50〕，黄薇主编书，第33页。

〔52〕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5928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申252号民事裁定书。

〔53〕 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终820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

〔54〕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

〔55〕 参见吴小兵：《赔礼道歉的合理性研究》，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前引〔20〕，张红文。

响的目的是恢复原状，根据《民法典》第1000条的规定，消除影响应当与行为具体方式、造成影响范围相当，由此一来，恢复原状至少存在“方式”与“影响范围”两方面的限制。因消除影响最终关涉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两项对立命题，故消除影响请求权的实现应恰当处理对立关系的平衡。

（一）行使前提：相关主体产生了错误认识

名誉本就与社会评价相关联，名誉权被侵害表明社会评价下降这一错误认识已产生，消除影响的目的是消除错误认识。侵害他种权利则非当然如此。比如，在权利人属于明星人物时，如前述“任达华案”“林心如案”“姚明案”中，法院均未提及要求原告证明错误认识的存在，故是否对于公众人物，非法使用即代表着会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当然需要消除影响？再如，在一起著作权纠纷中，法院指出，对于硕士论文抄袭其他学者文章的行为，因其学术影响力不足以造成原告损失，且已经删除了抄袭文章，故不支持消除影响请求。^{〔56〕}在该判决中，法官实质上已将“不利影响现实存在”作为消除影响的前提，同时认为不能仅依据抄袭的事实判决被告承担消除影响义务。由此可见，侵权行为成立并不必然与消除影响请求划等号，而是否需要证明错误认识等不良影响现实存在则直接影响权利人的举证难度，故需要将其作为一项前置问题加以讨论。

事实上，只有当不利影响现实存在时，义务人才有消除的必要，否则其发布的澄清声明将因失去指向对象而丧失意义。况且，侵害标表型人格权、知识产权的行为至多属于侵害行为，错误认识的发生则属于损害后果，只有当损害现实发生时，才成立债法意义上的损害，进而有通过消除影响来弥补损害的必要。原则上，原告需要就侵权行为成立的所有要件进行逐一证明，才具备向被告追究责任的基础，因为损害后果的现实发生本就构成消除影响责任履行的前提。但是，若其能证明第三人出于混淆的目的非法使用上述权利时，且依据“经验法则”法官可直接做出相关公众会产生错误认识的“事实推定”时，权利人已无需再对错误认识这一“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10条第4项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上述判决中法院之所以未要求原告证明错误认识这一损害后果，并非代表损害非必要，完全有可能是因法官运用了“事实推定”这一证明规则，进而将要件事实转化成了典型的关联事实，并以具备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作为大前提，从而得出错误认识已发生这一结论。^{〔57〕}

譬如，对明星的人格标识进行经营性使用的行为，侵权人的目的就是使相关消费者误以为特定人物与产品有特殊关联，况且，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其标识符号相对比较敏感，其人格标识也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故商业使用会产生错误认识作为具备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符合“事物发展的典型经过”。只要原告能够举证非法使用这一关联事实，法院结合原告的社会身份，做出错误混淆产生之推定，实乃契合经验法则的结果。但是，对于非公众人物，因其人格标识并不具有浓厚的区分功能而难以使公众产生错误认识。若径行做出该种事实

〔56〕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陕民三终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书。

〔57〕 事实推定的推理过程，可参见郑世保：《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推定,则不具备高度盖然性而存在违反经验法则的可能。此时,原告尚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标识使用确会令人产生错误认识,使法官产生损害后果已确实发生的内心确信,进而支持消除影响请求。^{〔58〕}

著作权侵权是否会使社会公众产生错误认识需结合权利人与侵权人的身份做综合考量。侵权人的社会知名度越高,其社会影响力就越广,抄袭行为越容易引发公众对著作权归属的误解。与此同时,权利人的社会知名度越低,则越不容易引起社会大众对其作品的关注,反倒容易使抄袭者利用社会影响力倒打一耙,将抄袭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宣传。在此情形下,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因具有引发公众误解的高度盖然性,法院可通过事实推定认证损害存在。在“余征与欢娱影视《宫锁珠帘》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正是因为余征(艺名于正)作为知名编剧、导演,其摄制的作品具有巨大影响力,故法院在认定涉案作品构成抄袭的情形下,径行要求被告承担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59〕}与之相对,前述硕士论文所涉及的抄袭行为,确因被告社会影响力较小,而原告社会影响力大,故构成错误认识的可能性不高,在原告未充分举证时判决驳回消除影响请求有合理性。此外,专利、商标亦关涉到同行业人士的竞争问题,故权利人与侵权人的知名度、不同身份地位也表征着错误认识发生的不同概率,法院对经验法则的判断亦应参照著作权作同等处理。

(二) 行使方式: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相当

行为人承担消除影响义务时应与侵权行为的方式相当,此乃行为层面对消除影响义务履行的限制。因为消除影响的本质是为了填补损害,将权利恢复至事前状态,所以相当性原则要求义务履行也应以弥补损害为要义,将如实澄清错误认识作为界限。为实现该目标,最为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在相同平台空间通过相同方式消除误解。例如,对于口头造谣行为,以口头方式消除影响;在微信群里发布的造谣信息,在同一微信群发布澄清声明;在报刊上擅自使用他人姓名、肖像作广告,则在同一报刊上刊登澄清信息。^{〔60〕}然而,要求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承担消除影响义务,可能会发生履行不能的结果。若发布虚假信息的微信群事前已被解散,或者侵权报刊已被杂志社停止发行,此时要求被告按照相同方式消除影响并无可能。此外,严格遵循形式要求,责令行为人只能以原有方式消除影响,也难以起到消除影响作用。比如,口头方式的澄清行为可能无法为第三人所知悉,更无法令第三人确信是由侵权人作出的,无法真正达到消除影响的目标。

应当明确的是,消除影响作为弥补损害的方式,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相同,只要责任成立层面满足过错要件,在责任范围层面无论发生了多少损失,都应出于填补目的弥补全部损害。造成不利影响的范围应与损失数额作等同评价,不属于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范畴。^{〔61〕}正因如此,

〔58〕 此时往往需要运用间接证据。如原告需要证明人格标识侵权行为所涉及的时间、地域范围。如果时间越长或者侵权的范围越广,越表明人格标识的使用对客户信赖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当然,相比事实推定所依赖的经验法则,间接证明只有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形下,才得以成为法官认定事实的基础。间接证据与事实推定的关系可参见周翠:《从事实推定走向表见证明》,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

〔59〕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

〔60〕 参见前引〔46〕,王利明、程啸、朱虎书,第90-95页。

〔61〕 参见前引〔10〕,王泽鉴书,第83页。当然,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可能受到相当因果关系、法规范目的之限制。

消除影响并不需要完全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相同，拘泥于行为的形式反倒无法实现恢复原状的目的。不表意自由与权益保护的权利位阶本不存在高低之分，在过错这一利益调节机制的作用下，牺牲前者保护后者本就是恢复原状的要义所在，只要是能够实现行为目的的方式，都因具备相当性而为法律所支持。对于适当方式的判断，则需要将比例原则作为评价基础。毕竟，与公法规范相同，私法规范中也存在大量责任承担方式适当性的判断问题，此皆关涉行为目的与行为手段的合比例性问题，作为公法基本原则的比例原则，因具有中立的工具属性可被适用于私法规范中。^{〔62〕} 比例原则的审查需要经过四个步骤：确定正当目的、手段与目的一致（合目的性）、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最温和方式（必要性）、手段与目的之间应适度且符合比例（均衡性）。任何手段都具备作为形式要件的“行为方式”与作为后果要件的“结果”，所以消除影响的手段也可再具体分为“澄清行为的具体方式”与“澄清行为会带来的影响”，而具体方式的实施是影响范围判断的前提，故应先对前者的合比例性进行审查。

原则上，具体澄清方式的选择应符合比例原则。譬如，即便侵权人以口头方式散播了虚假信息，通过撰写书面道歉信的方式来消除影响也完全满足行为适当性的要求。毕竟，行为人的目的是消除不良影响，而书面表达可以起到消除不良影响的结果（合目的性）；相比口头表达，书面形式具有一定的证明与公示效力，也是令第三人产生确信并消除不良影响的温和手段（必要性）；澄清声明的发布虽然干涉了行为人的不表意自由，但过错已将法律苛责的义务加以正当化，手段与目的满足合比例性的要求，并未带来因小失大的不良后果（均衡性）。正是因为忠实于损害填补，行为方式的相当性仅是一项底线要求，只有当澄清声明公告超出正当范畴而有损义务人其他人格法益时（如自我侮辱），比例原则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问题最终落脚到对澄清行为所能影响范围的判断上。

（三）行使限度：以受影响的相关主体可知晓为限

澄清声明的影响范围应等于不利影响的范围，以使受影响主体可知晓，进而消解错误认识。若前者小于后者，会因手段无法实现目的而不满足比例原则“合目的性”的要求。比如，删除帖子、断开侵权链接的措施因不能令相关主体完全恢复正确认识，故应排除出消除影响的外延。^{〔63〕} 对被告施加行政、刑事处罚的目的在于惩罚，而非恢复原告名誉，不能达到消除影响的效果。^{〔64〕} 公开判决书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消除影响的效果，但其仅在专业网站上公开，受众群体与产生错误认识的公众范围不能完全重叠，也不符合“合目的性”的要求。^{〔65〕} 若前者大于后者，则表明消除影响的某种方式已非消除错误认识的最佳手段，因欠缺“必要性”而违反了比例原则。譬如，若仅在区域有广泛知名度的商标被他人不当冒用，权利人仅可请求在区域内有影响力的报

〔62〕 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

〔63〕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申355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793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申2045号民事裁定书。

〔64〕 有法院将二者混同处理，认为对被告施以行政及刑事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原告的名誉。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申2414号民事裁定书。

〔65〕 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冀知民终310号民事判决书。

刊上发表澄清声明,而不得将该声明发表在全国性杂志上。〔66〕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利影响可能会因二次转载报道而超出侵权人所控制的范围。此时,行为人也应当对所造成的全部不利后果承担恢复原状义务。毕竟,二次转载报道实有利于错误认识的传播,在客观层面难以遮蔽违法性,况且用户群体的差异可能会在更广范围内引起不利影响,故对于造成的全部损害,对错误认识的产生有过错的侵权人应承担消除影响义务,需要在转载媒体上刊登澄清声明。与此种客观范围层面的扩大不同的是,前已反复强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应作为消除影响责任承担范围的权衡因素,因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故意抑或过失,过错要素的存在足以表明其未尽到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并对损害后果的类型具有可预见性,自然应弥补产生的全部损害,此乃过错归责要义所在。〔67〕况且,消除影响仅存在全有全无的问题,既无法根据过错程度选择具体责任方式的承担,也不能因为权利人对损害发生与有过失而要求过失相抵,进而仅承担消除部分影响的责任。〔68〕

值得注意的是,权利人、侵权人各自的社会知名度也会直接影响消除影响责任的限度,进而间接影响到具体行为方式的选择。毕竟,对不同权利人不利影响范围并不相同,对全部义务人施以完全相同的消除影响方式,会因为违反“合目的性”或“必要性”而违背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比如,非公众人物因没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其造成的负面评价通常也只是局限于熟人圈子或者社区范围内,此时就不具备刊报澄清的必要,只需要在微信群、朋友圈或者社区门口发布澄清声明。〔69〕强制要求其刊报道歉的行为,侵犯了行为人的不表意自由,并使其不良行为被过度曝光于公众视野,违反了“必要性”原则。相反,如果权利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物,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是利用他人的影响力,进而在该范围内令相关公众产生错误认识,那么就已经突破了简单的熟人圈子,自然有在公众媒体上发布澄清声明的必要。〔70〕

五、结 语

相比于直接的财产损失,社会公众对特定主体的认知偏差对权利主体的打击可能更为致命。在数字社会与信息时代,较低的造谣及侵权成本更使得被害人苦不堪言,进而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应当明确的是,对于名誉权、标表型人格权、知识产权等特定权利而言,使社会公众厘清其内在归属主体,并作出正确社会评价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使社会个体能够接受对自身

〔66〕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津民终941号民事判决书。侵犯企业名称权事由的案件中,亦存在类似的判决。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知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书。

〔67〕 有法院判决认为,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不高,故仅需要删除,但此无法起到消除影响的效果。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民申85号民事裁定书。

〔68〕 有法院直接认为权利人过错大于被告过错而排除了其消除影响请求,这也是错误的做法。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审二民申字第02196号民事裁定书。

〔69〕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闽民申4199号民事裁定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申260号民事裁定书。

〔70〕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793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知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书。

的正确反馈，既能使其感受到自身的社会价值，进而对自我产生正确的评价，又可为接下来意图采取的行为提供激励。正因如此，正确适用消除影响请求权，可为特定权利的保护提供重要制度工具。

Abstract: The normative goal of impact elimination is to eliminate the public's wrong understanding. The right of reputation,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 all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laim of impact elimination. "Restoring reputation" in legislative expression belongs to legislative excretion because it can be completely absorbed by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eliminating the influence, and does not have the typed interpretive significance. The elimination of influence does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prevention and preservation, and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absolute right of claim, which is the right of claim based on fault. As a statement of fact, the goal of eliminating influence is to repair the damage by means of restitution,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an apology, which is an expression of opinion intended to provide moral comfort to the victim and is not enforceable. In terms of specific 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imination of impac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relevant public does have a wrong understanding, but in individual cases, the court can directly make a presumption of fact based on the rule of thumb, and the plaintiff does not need to prove that the adverse impact has actually happene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judge the way and limit of the defendant's obligation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Key Words: Civil Code, eliminate the impact, the right to claim creditor's rights, restore to the original state,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责任编辑：王叶刚 赵建蕊)